

罌粟种植对近代茶叶经济的影响 ——基于福建的个案考察

高元武

(丽水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浙江 丽水 323400)

[摘要] 随着近代国内罌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不断攀升, 中国近代茶叶经济却逐步走向衰落。茶园和罌粟种植历史性的交叉在一起。种植罌粟对茶叶经济影响巨大, 罌粟与茶竞争田亩沃地、水肥资源、分流农村劳动力等农业资源, 间接影响了茶叶的品质, 阻碍了茶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罌粟种植; 茶叶经济; 近代福建

一、问题的提出

茶叶是我国近代对外贸易量较大的商品之一, 中国是世界茶叶市场主要供应国, 曾经一度垄断世界市场, 巅峰茶市后,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茶叶贸易急剧衰退^[1]。作为茶叶出口大省的福建, 茶叶对外贸易盛衰与近代中国茶叶贸易趋势相吻合。根据学者研究, 福建茶叶总出口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达到八十万担峰值后, 急转直下, 呈现剧烈下跌态势, 二十世纪初期出口量仅有高峰期的三分之一强^[2]。上海、汉口、广州等地茶叶出口贸易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样出现了下降。因此, 探讨近代中国茶叶经济为什么会出现衰退, 便成为农业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学界关于此问题, 尚未达成一致。有学者认为中国茶叶生产方式落后, 品质难以保证, 厘金赋税沉重, 洋商掌握茶叶外销贸易主动权^[3]; 汪敬虞认为对茶农沉重的经济剥削最终导致了茶叶贸易丧失竞争力^[4]; 姜修宪以福州为个案, 依据海关贸易报告和英国

领事商务报告, 认为制度因素才是造成华茶贸易衰退的内在原因^[5]。

各专家学者研究颇有力度, 但中国近代茶叶经济走向衰落是诸多因素多层次叠加累积的结果。本着详人所略的研究旨趣, 本文探讨近代罌粟种植对茶叶农业环境的影响。罌粟广泛种植, 在收益和烟毒的双重驱使下, 茶农弃茶种烟现象普遍, 大面积种植罌粟对茶叶的农业经济影响巨大。

二、罌粟引种福建时间和途径考述

罌粟, 果实乳汁可以提炼鸦片, 又称之为乌香、阿片、阿芙蓉等, 十世纪之前多做药物使用, 量大容易上瘾, 社会危害极大。十九世纪之前零星栽培, 规模有限。英国对华鸦片贸易输入后, 国内罌粟种植面积随之迅速扩大。国内普遍种植罌粟起于何时? 李三谋研究后认为, “罌粟先由印度传至云南而有南土, 再传至四川而有川土, 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 由是而至贵州, 而至山西”,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国内始有罂粟种植^[6]；有学者认为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国内就有罂粟种植，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给道光皇帝奏章里提出听任国内种植^{[7](P2)}；也有学者认为，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国内才有罂粟种植，中英鸦片战争之前并无罂粟种植^{[8](P301)}。据仲伟民研究，“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迟在二十年代后期，种植罂粟在全国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9]。

史料记载，福建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鸦片传入，在漳州月港货物输入税单有“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的记载^{[10](P216)}。清雍正七年，葡萄牙人“输入鸦片二百箱，自高牙所运来，输之厦门漳州泉州一带”，此时鸦片已绝非仅作为一种药材使用，而是作为吸食用，“厦门漳州泉州一带多有吸食之人和开设鸦片馆者，而输入之量即增吸食之人必更加多”^{[11](P15)}。这是福建吸食鸦片较早的记载。福建种植罂粟的历史稍晚一些。通过查阅地方志和民国相关著作，福建罂粟种子来源途径有两种可能：其一，福建试种罂粟始于乾隆十五年，罂粟种子来自印度，福安“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福安从印度引进罂粟种子试种”^{[12](P579)}，规模有限；其二，也有学者研究指出福建最早罂粟种子来自香港、广州，“罂粟种子种植沿海洋道，由香港、广州运往闽江浙各地”^{[13](P9)}，商人为了牟利，走私鸦片同时带来广州、香港的罂粟种子，种植并传授制作鸦片的方法。两种传播途径皆有可能。

嘉庆后福建沿海地区的罂粟种植多了起来。嘉庆十二年（1807年），外国鸦片从海上进入福建省，逐步向福安、霞浦等县渗透，罂粟广泛种植^[14]。道光朝进士庄俊元，在厦门曾“又禁止种植鸦片，赈济饥民，禁止官吏乱抓百姓”^[15]，可见道光年间，厦门鸦片种植已经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建阳县志记载，福州港在光绪年间开始转运国内生产

的烟土，同时本地也开始试种，“水吉一带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毒贩仔从福州运来大批的四川、云南鸦片。云南烟土来路断绝后，改从江西运进烟土，本县亦零星种植”^[16]。

鸦片战争前，福建漳州诏安一带是鸦片输入的主要地点，“诏安县与广东饶平县之柘林、黄岗及澄海县之汕头接壤，此三处，系水陆热闹码头，亦即鸦片囤聚之所，诏安奸民或用本地小船，或在各项货担，带土而回……分销本省各处”^{[10](P218)}。光绪年间，福建罂粟种植已较为普遍，种植面积“连畦接畛”，“福建沿北半省，农民好利，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而好烟者亦传染愈众”^[17]。福建省南部情况更为严重，同安、晋江、惠安、安溪、长泰、永春、南安、漳浦、龙岩等地，“土药（罂粟）因种植者见其大可获利，故田亩之专用以种罂粟而不种米谷与别种食物者，日有所增”^[18]。甚至连风景宜人的厦门鼓浪屿小岛亦种罂粟，“昔日种植薯菜之田，年来亦见长满罂粟”^{[19](P461)}。推测此时茶农已经觉察罂粟的收益远胜茶叶，“小民好利”，茶农开始弃茶或稻，改种罂粟。

福建罂粟在乾隆朝只是局部零星种植，时间不会早于乾隆十五年，面积和产量有限。光绪年间，福建罂粟种植已是较为普遍，“连畦接畛”。

三、福建罂粟种植区域范围及分布复原

福建是罂粟产销的重要省份，种植面积广泛。邓世超研究后，把福建和广东、江西并列为近代中国七大罂粟产区之一^[20]；傅建成认为鸦片战争前国内便已经形成了较有影响力的罂粟种植区，“种植罂粟、熬制鸦

片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与广东毗邻的漳州、泉州一带，种植罂粟，熬制鸦片的质量尚属上乘，以致有“建浆”的称谓^[21]。

据御史汤云松 1851 年的奏章《湖广道监察御史汤云松奏为现拟绞监候人犯于情法未尽允协请变通禁烟章程事》记载，“栽种罂粟虽奉明禁，而滇黔、四川、浙温台、闽漳泉各郡久已连畦成亩，栽种熬膏，近闻直隶之顺德、甘肃之平凉有种植，则是年终结报，已成具文”^[22]。据此推测，福建地方官有粉饰太平，隐瞒本省种植罂粟的情况。“福建鸦片产地主要是在闽东山地（戴云山）和闽东南丘陵的同安、安溪、晋江、漳浦、永春、惠安、长泰、南溪、富宁等县”^{[7](P19)}，1901 年，据统计全省罂粟种植“面积达到 160 万亩，鸦片产量突破二万担”，特别是福建北部县区、闽东山地以及闽东南丘陵，“产量足万担，占闽省之泰半”^{[23](P49)}。光绪二十八（1902 年）年有了具体产量的记载，据海关统计，“同安生产罂粟 2130 担，安溪 318 担，晋江 300 担，南安 294 担，惠安 186 担，永春 462 担，长泰 780 担，漳浦 300 担，共计 4771 担”^{[24](P159)}。至于全省种植罂粟情况，光绪

末年，闽浙总督松寿上奏朝廷，估计全省罂粟种植面积 37500 亩^{[18](P524)}。同年厦门商政局农业现况报告上记载，“同安一县产土烟 2130 担，次年又增至 4008 担”^{[17](P435)}，三都澳海关十年简报初步估计全省产土烟三万余担^{[18](P187)}，与闽浙总督奏报朝廷的罂粟产量相差无几。

二十世纪以后，福鸦鸦片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闽省需要，还有一部分通过泉州、福州港走私它省，亦有逃避厘金关卡，经陆路运往浙江或江西等地销售^{[18](P243)}。

关于福建鸦片相关研究，学界成果主要集中在烟祸的危害、鸦片走私贸易、近代军阀与鸦片以及禁烟等领域^[25]，而罂粟种植对茶叶经济的影响似乎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如果不调查具体种植罂粟的府县分布范围，不梳理清楚罂粟种植区域是否与产茶区相重合，就无法解释罂粟种植与茶叶贸易盛衰之间的关系。在查阅大量福建地方志，同时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对福建种植罂粟的府县进行了复原。由于文献资料过于庞大，在统计的过程之中难免出现遗漏。摘录如下表：

表一 近代福建罂粟种植府县及种植情况表

州县	罂粟种植情况
宁德县	境内山田光秃，风沙为害，瘟疫流行，吸毒成灾，经济萧条地方摊捐派款，种植鸦片……种烟苗（罂粟）并制土鸦片走私，常关对此无策。
福鼎县	洪灾后，县当局明令农民种烟自救，一时间福鼎种植鸦片之风盛行……截留税收，听认种植鸦片，征收鸦片捐……黄丹岩屯头、斗门、岚亭、后坪、三佛塔等村土烟最重。
惠安县	山腰坝头，开征田亩捐（即鸦片捐），数额为每亩 40 银元，山腰乡派征 1.6 万银元，邻乡峰尾原非种植鸦片地区……后弃茶种烟……坝头区勒索 50 万元白银的“烟苗捐”。
建阳县	水吉一带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毒贩仔从福州运来大批的四川、云南鸦片……水吉县各区，特别是山区地带，开始种植鸦片，面积达千亩……全年销售烟土 9.36 万元，比全县税收款 6.18 万元还多 3.18 万元。
连城县	农民种植罂粟，并按户征收土膏税……土膏税五万六千元……民国 13 年，军阀带兵下乡强令宁德县农民每户至少种植罂粟 1 亩，抽捐 10 元。
莆田县	鸦片厘金始自清咸丰六年（1856 年），由兴泉永道定每箱 48 元……膏捐（鸦片捐），莆仙自咸丰九年（1859 年）开征，地方税吏视之为“摇钱树”……莆田烟苗捐 20 万元……莆田县征烟苗捐 160 万元、鸦片公卖费 18 万元、烟土印花费 30 万元……罂粟犹如花海。
上杭县	种植罂粟，收厘金于商卡。

(续)

州县	罂粟种植情况
松溪县	全县种植罂粟 577 人, 全县尚有暗地吸食和种植鸦片者, 查处毒品案件 4 件 7 人, 种烟地点 18 处, 面积千余亩。
同安县	让官僚豪绅包揽鸦片摊馆、种植罂粟, 吸食鸦片泛滥成灾……县审结种烟及烟毒案 37 件、43 人, 其中判处死刑 6 人……同安县领照的烟民 7055 人, 为全省最多。
安溪县	勾结县豪强在中赤、和平两地种植鸦片, 面积五百余亩……县府与地方驻军串通一气, 公开强收烟捐, 还在全县种植鸦片数万亩。
永泰县	泮口乡的白沙、口坑、祥窰等地, 农民种植鸦片, 制鸦片膏, 当时烘炉、灶销量大, 最好年份产值达 20160 元, 产量 12600 担。
漳浦县	漳浦已有人吸鸦片, 光绪年间, 有种植鸦片的。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 漳浦鸦片产量 300 担, 次年为 730 担。吸毒者日众, 上至政府官员、绅士, 下至差役、轿夫及百姓……漳浦摊派“田亩捐”(种植鸦片捐) 年额 50 万银元, 任农民种植罂粟 (鸦片), 贻害无穷。
政和县	宣统三年 (1911), 政和县设禁烟公所, 调查吸烟人; 乡设禁烟支社, 明令禁止吸鸦片烟、种罂粟……镇前联保查禁偷种烟苗, 查处 45 岁以内之烟民 48 名。
周宁县	县判处栽种罂粟犯雷某 10 年徒刑……先后毙种植罂粟犯 3 名, 对 152 名烟民进行发证戒烟。
安溪县	烟苗捐年五十余万元, 山腰凹地便种罂粟, 不见有茶园, 茶农变烟农……面积千亩, 隐匿茶园间。
大田县	福建省政府阳成有府民丁永一一〇三〇二号训令开: 兹届烟苗入土季候, 各地应照历届禁种成案, 扩大宣传告诫, 先事预防。凡属深山穷谷, 邻封交界, 偏僻地区, 人迹罕到之处, 更应贯注全力, 普遍查察, 周密巡视。
福安县	早在清乾隆十五年 (1750 年), 福安就从印度引进罂粟种子种植。光绪十三年 (1887 年), 罂粟广泛种植……慰发布《告各乡父老子弟书》及《示禁种烟苗文告二则》, 实施禁烟……县知事率团勇往溪柄、溪南、溪北等 75 乡督拔鸦片烟苗 4540 余亩。
瓯宁县	城内天主堂法国人季若仪在花园内栽种烟苗, 被当场拿获……山深处茶园变烟园藏污纳垢。
晋江县	晋江永宁、衙口、深沪、陈埭等地都有人种植罂粟, 晋江受鸦片毒害甚深……鸦片捐, 有禁烟无成效, 种罂粟, 罂粟抽税额 20 万元……张林乡种植罂粟旺盛年份, 年产鸦片 2500 公斤以上, 晋江成为闽南地区毒品的源头, 张林及其附近的几个村落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罂粟。晋江县种植、制贩、吸毒者日益增多。
邵武县	山中大种罂粟 (鸦片), 铲除 35035 亩……马鼻、官坂、官岭等地农民大量种植罂粟。每户至少 1 亩, 亩抽烟苗捐 10 元……东涌岛种 8 万株, 壶江岛种 5 万株。
光泽县	民众种植大烟苗, 漫山遍野, 茶烟杂处
罗源县	农民每户至少种植罂粟 1 亩, 抽烟苗捐 10 元。
明溪县	除烟苗, 其结果烟苗未能铲除, 烟赌也并未禁绝, 鳌枫乡的中溪、小珩等山村铲除罂粟。
南平县	农民种鸦片烟, 在各主要乡镇设立烟苗局, 开征烟苗捐, 年征额达百万元。
南靖县	全县查禁种罂粟田 598 亩。百姓种罂粟, 私设烟馆, 以图暴利。
平潭县	创办垦殖局, 勒收烟苗田亩税。
平南县	据调查全县有 409 人种植罂粟、17 人贩运鸦片、9 家烟馆、169 人吸食鸦片, 铲除罂粟 52 万多株。边远山区种植罂粟, 先后铲除种苗 676 亩……代溪、寿山、双溪等先后铲除烟苗 194.8 亩。
沙县	私下出售烟苗种子。翌年春, 大烟欠收。
霞浦县	种植烟苗, 后扩大至千余人。
尤溪县	全县私种烟苗 36.50 亩。

资料来源: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2 年版; 福建各县市地方志; 福建省情资料库: <http://www.fjsq.gov.cn>。

统计表明, 近代福建罂粟种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县: 霞浦县、福鼎县、宁德县、安溪县、大田县、南平县、沙县、永安县、建安县、瓯宁县、建阳县、崇安县、政和县、松溪县、邵武县、光泽县、泰宁县、建

宁县等县。之所以断定以上县种植罂粟较为普遍, 判断的标准如下:

其一: 如县志明文记载种植罂粟、铲除罂粟田亩、征收烟苗捐、土膏捐等, 该县必定种植罂粟。

如建阳县：水吉一带从清朝光绪年间开始，毒贩仔从福州运来大批的四川、云南鸦片……水吉县各区，特别是山区地带，始种植鸦片，面积达千亩……全年销售烟土 9.36 万元，比全县税收款 6.18 万元还多 3.18 万元。

其二：该县发布官文政令，明确要求禁种罂粟。

如长乐县：《县训令》：“查烟苗花会危害健康，耗财伤神，为祸至烈，早经政府三令五申悬为厉禁……乡镇长送照，切实责令保甲长查禁并迅将栽种烟苗户主以及开挂花会首要尅速密查，分别登记，具报以凭核办，案关禁政，勿得视为具文切要”。

大田县：政府阳戌有府民丁永一一〇三〇二号训令开：“查禁种烟，贵能拔本塞源。关于搜毁罂粟种子，严防偷种等，当经迭令切实办理在案。兹届烟苗入土季候，各地应照历届禁种成案，扩大宣传告诫，先事预防。凡属深山穷谷，邻封交界，偏僻地区，人迹罕到之处，更应贯注全力，普遍查察，周密巡视……仍将办理情形随时具报为要”。

其三：县志记载因种植罂粟而被绳之以法，处以极刑的司法案件。

如松溪县：全县种植罂粟 577 人，尚有暗地吸食和种植鸦片者，查处毒品案件 4 件 7 人，种烟地点 18 处，面积千余亩。

罂粟种植分布区域和福建传统产茶区是否相互交合呢？清卞宝第曾任闽浙总督，著有《闽峤輶轩录》一书，书中载有福建茶叶的地理分布：闽北茶区，包括建宁、延平、邵武 3 府，产茶有建阳、崇安、建安等 17 县；闽东茶区，包括福宁、福州 2 府，产茶有福安、宁德等 15 县；闽南茶区包括泉州和漳州，产茶有安溪、晋江、南安等共计 14 县；吴觉农《中国茶叶复兴计划》一书也详细介绍了福建近代产茶地区：福清、长汀、晋江、南平、沙县、崇安、建阳、政

和、水安、建瓯、安溪、霞浦、宁德、邵武、光泽、松溪、古田、平南、福安、闽清、福鼎、连江、大田、永春、德化、永泰、建安、漳州等县^{[26](P19)}。

根据近代文献资料或县史志复原福建近代种植罂粟和茶叶县的状况，绘制成图一“福建种植罂粟与茶叶的县分布示意图”。此图清晰展示了近代福建种植罂粟和茶叶的区域特点：福建罂粟种植地主要分布在闽东、闽南、闽北三大区域，闽北和闽东种植罂粟的县数目较闽南多，同时种植的面积也较大；福建产茶之地相对集中，同样是分布在福建的闽东、闽南、闽北三大区域，这与福建近代罂粟种植县区相互叠合。福建茶叶种植传统历史分布区和近代罂粟种植的县相互交叉，两者种植范围存在交集。福建茶叶和罂粟种植在特定历史时期相互交融在一起。

图一：福建种植罂粟与茶叶的县分布示意图



四、罂粟种植对茶叶经济的影响

福建种茶历史悠久。福建素有“八山一

水一分田”之说，省内地形以丘陵和山脉为主，平原狭小，气候适宜，土壤呈酸性，极其适合茶树栽植，自宋朝起福建便以盛产名茶而誉满天下。近代以来茶叶种植分布于福建各县，茶业逐渐成为经济支柱。但是，随着罌粟“小农好利，植罌粟之利，较茶稍厚，茶农弃茶而种罌粟”，闽省气候、土壤等条件不是种植罌粟的理想环境，但种罌粟者仍趋之若鹜。福建种植罌粟对茶叶经济影响是巨大的，表现是罌粟与茶竞争田亩沃地、水肥资源、分流农村劳动力等农业资源，造成经济畸形发展。

1. 挤占茶园土地资源，压缩茶叶种植面积，影响产量

罌粟种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农业的经济结构，不仅打乱了麦稻的种植，而且影响茶等经济作物种植。罌粟种植首先侵占原茶叶种植的田亩。罌粟的经济收益是稻麦的数倍不止，“种植罌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稻”，“今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殊不知弃稻而趋利乎”^[27]。清末福建罌粟种植仅限于山岭丘陵偏僻处，但产量很是可观。《清朝续文献通考》载，1909年福建产罌粟15007担^[28](卷五五)，“一亩地生产40或70两”，以亩产40两计算，每担1000市两(一担50千克，1千克=2斤=20两)^[29]，需近四十万亩土地方能达到如此产量。可见良田耗费之巨。

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罌粟种植更为普遍。“鸦片已经成为本省的一种产品。种植罌粟的土地到处可见，禁止种植罌粟的规定名存实亡”^[18](P119)。厦门《江声报》报道上海召开全国国民拒毒会的盛况，报告提到“全国最大种烟区域为川、滇、皖、闽、热五省，而福建实属第一”，地方军阀强迫种植烟苗，“闽南、闽北，除金门、厦门两岛外，几乎无地不种烟苗”^[30]。闽省气候、土壤等条件不适应种植罌粟，但地方军阀强

迫种植，且面积广大，如省防军陈国辉部强令“晋江、南安、惠安8县强迫种罌粟达百万来亩”，张贞部在“云霄、诏安、平和、漳浦等县山区，交通偏僻之地”，与土匪豪强相互勾结，强迫种罌粟^[31]。烟田占茶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安溪县方志记载，“近来茶山颓废，茶树隐蔽之处，杂种罌粟”，“茶树荒废，烟苗茁壮”；“万山深处皆有罌粟花”；盛产红茶的武夷山地区“自各国通商始，商民偶沾其利，逐争相仿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32](P2)，政和县“县膏腴地十之二三栽植罌粟”；“土药(罌粟)因种植者见其大可获利，故田亩之专用以种罌粟而不种米谷茶树者，日有所增”。

随着罌粟种植面积的扩大，福建产茶区经济逐步走向衰败。据茶史学者陶德臣研究，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茶利益大大减少，此时期“福建茶农经营状况尤为不佳，亏本现象屡见不鲜”，到八十年代，福建茶农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访察茶叶情形文件》记载福建北岭一带，茶园“十荒其八”，茶农哀叹“种茶者勤劳艰苦，大受茶累矣”，闽南产区历来盛产乌龙茶，也是“抛荒多矣”，“茶获之利不若烟花之二三”^[33](P447)。种植罌粟的冲击是巨大的。1887《闽茶减厘示》载福建茶“较昔贱至数倍”，北岭茶价“比前低有大半”，1890年海关关册记载，福建“茶市迷茫，种茶者无不亏本，茶市衰颓，小民困苦惟望”^[34](P79)。为求生机，此时期茶农弃茶改种它物，“以种罌粟，较之种茶尤获厚利”。

茶园逐步被挤占，茶园面积逐渐萎缩，伴随而来的便是产量下降，对外贸易量的下跌。1887年，厦门港茶叶贸易量九万担，一年后减少了两万多担，并且逐年下降，1901年贸易量七千多担，仅是1887年贸易量的7%，在此期间除1891年出现短暂贸易量上升外，均呈现一片颓废态势^[35]。茶

叶产量和贸易量双双下降，是茶园被挤占，种植面积萎缩的必然结果。茶史专家朱自振估计，“我国茶园面积至少减少或荒芜 38%”，可见茶园面积减少之严重。

2. 罌粟与茶园争夺水肥资源，耗费地力，品质难以保证

罌粟喜丰腴膏地，极好肥沃田地。罌粟种植极耗费地力，光绪年间曾国荃曾上书朝廷：“民户以丰腴水田，种植罌粟，此地力日穷也，而五谷反植于贫瘠之区”^{[36](P268)}。在选择种植罌粟的田亩上，福建茶农亦是如此。茶农首选“上等田地”种植罌粟，以保证罌粟的收成。福建本是地狭人多，土地欠肥沃，良田有限，茶农反而把仅有的良田用于种植罌粟，把农家肥料施于罌粟园，晋江文献记载“茶农集农肥，投之与罌海，以求好利”^{[15](P872)}。更有甚者进口硫酸盐肥料用于罌粟田，据 1928 年《福州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记载“每年海关进口的硫酸盐肥料，其中百分之六七十，为供给种植罌粟之用”^{[18](P153)}，“由于进口了大量的骨肥和豆饼用于施肥，据说鸦片的质量已经大为提高”^{[18](P155)}。反观茶树园，既得不到充足肥料供给，也无从谈起精细管理，尽量节省茶园费用，降低成本，《访察茶叶情形文件》文献记载“不用肥地物料”，更“不去地下野草”。缺少肥料和管理的茶园，其结果必然是产量逐渐降低，茶园亩产毛茶仅仅数十斤，而“印度每英亩每年可产茶 600 余磅”^{[33](P1212)}，两者相差巨大。茶叶质量也难以维持。茶叶质量的下降，茶叶价格必然受影响，福建慢慢显露出卖茶难问题，福建茶农，“山头种茶者因见茶市日坏，无利可获，遂将茶树焚去，改种山芋”^{[18](P652)}。

3. 罌粟种植引起农村劳动力资源再分配

傅建成著文指出“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逐渐走向萎缩衰微的过程中，鸦片种植的确

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重要因素”^[37]。土地和劳动力是农业发展的根本。罌粟的广泛种植，在烟毒和收益的双重影响下，很大一部分产茶区的农村劳动力被逐渐从茶叶经济中分流出来。种一亩罌粟需要多少人工呢？秦和平通过调查统计认为“一亩土地的罌粟需要人工 189 工、牛工 22 个，比同样面积的耕地的水稻、玉米或者小麦用工量多 3—10 倍”^[38]。如此算来，1909 年福建罌粟用地近四十万亩，年需人力工时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茶农投入大量的人力养护罌粟，茶园管理自然不到位。

千百年来，中国茶叶制作任沿用纯手工操作，需要大量的人力工时。茶业多年来在省内占据重要经济地位，在这时期开始衰落了。据《闽海关十年报》：“人们没有花费很多的劳力费用于耕作茶树，而每年要花很多时间去搞其他活计，比如罌粟。茶叶贸易一直处于衰落状况”^{[18](P136)}。据崇安县志记载，每逢罌粟收割之时，“三五成群，穿梭于山间，不分昼夜”，“任茶园生长，无人搭理”；建安“罌粟熟时，方见农户田间劳作，农闲时多斜躺横卧，吞云吐雾”，“似不知茶园事”；泉州流传种植与吸食鸦片的民谣：“人吸鸦片，鸦片吃人，种罌粟，耗地力，吸鸦片，耗财力，十亩茶五亩烟。鸦片入骨髓，未死先成鬼。新鬼瘾小故鬼大，新鬼面焦黑，旧鬼无人色”^{[39](P291)}。闽海关税务司记载“农民放弃这个一度他们喜爱的行业，以前生产名茶区出现痛苦的景象，种茶被忽视了”^{[18](P94)}。伴随着罌粟种植面积的普遍，农民沾染烟毒的影响，茶农从事茶叶的积极性明显出现了衰落。

广泛种植罌粟对茶叶经济冲击是巨大的，罌粟之利较茶厚数倍，茶农忙于罌粟无暇顾及茶园。茶农人力工时不足是影响茶叶质量维持的因素之一。茶叶质量低劣，其市场价格不能与国外茶进行竞争，这是影响茶

叶经济锐减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之,福建近代茶叶贸易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逐步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复杂的,非单一原因造成,而是诸多因素多层次叠加的结果。近代罂粟种植区与茶叶传统产区相互交叉,罂粟的影响是消极的。罂粟的种植对茶叶影响巨大,通过挤占田亩沃地、水肥资源以及分流农村劳动力等形式,间接影响了茶叶的品质,阻碍了茶叶生产技术的提高,国际市场逐渐被后起的印度、锡兰等抢占。在近代福建茶叶经济贸易逐渐下降的过程中,鸦片种植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罂粟种植是农业经济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基金项目:浙江2015教育厅规划课题“西方与近代茶叶生态经济变迁”(课题编号:2015SC223);丽水学院社会科学学术团队2014培养项目“近代茶生态经济影响因子研究”]

参考文献:

[1] 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J].历史究,2003(6);袁欣.1968—茶叶贸易衰弱的数量分析[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1);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发展阶段与特点[J].中国农史,1996(2);仲伟民.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J].学术月刊;2007(4).闻云峰.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衰减的国际市场分析[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1(5).胡赤军.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J].东北师大学报1994(1).

[2] Thom as P. Lyons, ChinaMaritime Customs And Chinas' Trade Statistics (1859—1948), W illow Creek Press, 2003, P P. 97—98.

[3] 仲伟民.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J].史学月刊,2007(4).

[4] 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J].近代史研究,1987(6).

[5] 姜修宪.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2).

[6] 李三谋.鸦片在山西的危害[J].晋阳学刊,1990(6).

[7] 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中国[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8]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9] 仲伟民.19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J].文史哲,2009(5).

[10] 林仁川.福建对外贸易与海关史[M].福州:鹭江出版社,1991.

[11] 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34.

[12] 福建省福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安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13] 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14] 福建省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德地区志,清至民国时期司法[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15] 鲤城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鲤城区志卷三十六人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6] 建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建阳县志第二十篇公安司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出版1994.

[17] 异闻报馆.益闻录,第201号[N].,上海.徐家汇益闻报馆,1882.

[18] 上海通商海关总税务司署.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总册厦门口[M].上海:通商海关总税务司署光绪二十二年.

[19]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北京:三联书店,1957.

[20] 刘世超.晚清罂粟种植及其对农业的影响[J].农业考古,2014(6).

[21] 傅建成.略论鸦片战争前国内种植罂粟问题[J].人文杂志,1999(2).

[22] 湖广道监察御史汤云松奏为现拟绞监候人犯于情法未尽允协请变通禁烟章程事.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录副奏折,档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03—4016—064

[23] 蒋伯英.福建革命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49页.

[24] 邹尔光.三都澳海关十年报,福建文史

资料第十辑[M].,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25] 林仁川. 清代福建的鸦片贸易[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5 (1); 林星. 福建地方军阀与鸦片[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0 (1).

[26] 吴觉农, 胡浩川. 中国茶叶复兴计划[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5.

[27] 中华书局编辑部. 筹办夷务始末卷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4.

[28] 刘锦藻. 清朝续文献通考, 卷五五. 商榷. 二七[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29] 张巨保. 清季贵州罂粟种植概况[J]. 农业考古, 2013 (4).

[30] 林星. 福建地方军阀与鸦片福建驻军勒种烟苗情形[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0 (1).

[31] 林志光. 福建文史资料. 第 3 辑[M].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

[32] 卞宝第. 卞制军政书. 第四卷, 清刻本, 1908.

[33] 姚贤镐.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34] 上海通商海关造册处. 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 下卷. 光绪十六年.

[35] 彭景元. 试论近代厦门茶叶贸易五十年[J]. 农业考古, 1995 (4).

[36] 曾国荃. 曾忠襄公奏议[M]. 台湾: 文海出版社, 1903.

[37] 傅建成. 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J]. 西北大学学报, 1995 (11).

[38] 秦和. 平鸦片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及其种植面积考订[J]. 中国农史, 2003 (2).

[39] 刘守斌. 中国共产党对太城市的接管[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On the Influence of Poppy Farming on the Modern Fujian Tea Industry

Gao Yuanwu

(College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Lishui University, Lishui, Zhejiang 323400)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increase of modern domestic poppy cultivation area and yield, modern Chinese tea economy declines gradually. Poppy cultivation and tea garden then existed together in history. Poppy cultivation has had a huge impact to the tea economy, poppy competes with tea in field, rural labor resources, water and other agricultural resources, causing indirect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tea,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ea economy.

Key words: Poppy cultivation, Tea economy, Modern Fujian

[作者简介] 高元武, 男, 丽水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近代农业经济史。